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 知识体系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

程正民 程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程正民,程凯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301-09879-0

I. 中… II. ①程… ②程… III. 现代文学—文学理论—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506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

著作责任者: 程正民 程 凯 著

责任编辑: 谭 燕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879-0/I·07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1.75 印张 341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人们已经对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

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惟”这些东西为主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语境,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完全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

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过分“社会学”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面临学科体系受到冲击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如果不一味滑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一味坚持其二元对立的僵硬的方法,那么由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一些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展的广阔的空间。

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不值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我们不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外国的文化研究与我们的文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异同?一般认为,国外的文化研究是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特色是一种政治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晚期,早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被文化的渗透所代替,是让人异化,舒舒服服地变成奴隶,成了奴隶还感觉不到。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关键的词语是种族问题和东方主义、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地域问题和社群主义、阶级问题和社会主义、古今问题和新历史主义等。其研究是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出发,而选取了这样一些话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批批的文艺学流派。我们的文化研究则要走自己的路,或者说要按照中国自身的文化实际来确定我们自身的文化诗学的思路。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文化诗学研究就其基本原则说可以有五点:

第一是历史优先原则。文化语境的研究,不论我们是研究现代的文学问题还是古代的文学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放置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尽管绝对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难以追寻,但是无论如何难,我们还是要自觉地去。过去我们的研究也常这样做,但我们常常不够自觉。更多的时候,就理论问题谈理论问题,注意的是观点和形式逻辑,所以别的专业的人士常说我们搞理论的人所写的文章比较空。文化诗学应该自觉改变这种状况,使我们讨论的问题进入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自然会凸现出来,自然会摆脱那种脱离现实的状况。

第二是对话原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还是研究前人的文学理论,都是对于作家、作品或原有理论家、理论作品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不是独语,而是一种对话。我一直主张古今要对话,古和今是两个主体,要进行对话,要把古代的东西激活,然后进行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其次是中西的问题。与古今问题一样,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不可以全球化。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研究中很热的一个问题,这里面问题很多。我认为,中西问题是

一个对话和共享的问题。另外,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或理论家的一种对话。对话要真正的平等才能深入地展开。就像我们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一定要平等相待,充分地恳切和真诚,彼此才能敞开心扉,通过交谈,做到双方都受到教益。我们在对作家(作品)、理论家(理论著作)的研究中也应该是如此。把对象也当成一个值得尊崇的主体,想尽一切办法激活它,让它似乎也真的成为一个鲜活的主体,能够袒露自己的真意;而作为研究者也自然是一个主体,能以商榷的态度,而不是以强加于人的态度,与对象实现真实的对话。只有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才是比较客观的和可靠的,而不是主观的、随意的。

第三是自洽原则。文化诗学的研究,应该是圆融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例如其中的阐释、比较,不能自相矛盾或前后矛盾,应该在观点和方法上一以贯之,逻辑上能自洽而圆通。你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和新的比较,但必须合情合理。所有片面的论述,其中弱点之一,就是不能逻辑自洽。

第四是联系现实问题原则。学术研究完全可以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的独立性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初的杰出学者王国维就说得清楚。但文化诗学的思路则如上面所述,应该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研究,提炼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来。这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正好是现实所缺失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文化诗学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弥补现实的不足,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馈。当然,我们的研究可能不是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不可能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那样正面解决社会问题。但从诗学的视野出发的研究,可以以间接方式回应社会,不也很好吗!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累积的问题很多。文化诗学应该有问题意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文化研究应该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同步的。教科书是最典型、最体系化的现代知识形态。近百年以来现代文论教材和教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程,经历了多次结构性的变化。研究这个过程既可以从大学学术体制的侧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可以为当今文论教学和文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益的启示。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教材和教学经历了三次转型、三次结构性变化。

第一次是从 20 世纪初到 30 至 40 年代,文论教材从以传统文论为结构核心转向以新文学观念为结构核心。这个时期出现的文论教材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传统文论为结构核心。从这部分教材的演变,可以看出传统理论范式和现代理论范式的差别以及传统文论退出教材结构核心、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过程。第二种是西方文论教材的引入。这些教材带来现代文学观念和现代学科规范,体现了学科的自觉。第三种是新文学影响下的文论教材。从这部分教材可以看出新文学观念如何被体系化和知识化。之后“科学的文艺论”的引入则引发了对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检讨和对文学重新定义的浪潮,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立场的文学理论教材逐步占据主导位置。在此基础上,三四十年代译介过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论推向更规整的形态。

第二次是从 1949 年到 1966 年,这个时期文论教材和教学的重要特点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学科意识被淡化了。文论教材基本上采用了苏联文论教材的内容和体系,其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地位的突出使教材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而教材的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以及教材的政治化和哲学化又使教材和教学陷入僵化和停滞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论教材和教学

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同时,不少学者也为文论教材和教学的学科自主性做了抗争,这两者之间在这个时期一直存在内在矛盾和紧张关系。

第三次是从1976年到现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使新时期的文论教材和教学出现了新的局面,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文论教材和教学摆脱了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影响,摆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回到了文艺学学科本身,学科意识代替了政治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文论教材和教学既重视民族传统的文论,又大胆向西方最新的文论开放,力求在融合中西文论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教学和文论教材。

百年文论教材和教学的变革早已成为历史,但它以其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第一,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论是同文学观念的变化互动的,文论教材和教学的生命力在于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

文学在现代中国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与社会政治保持有机互动的关系。相应地,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论也一直同现实文学观念、文化政治思想的演变处于相互作用的动态之中。文学观念的更新推动了文论教材和教学的革新,从传统的文学研究法到现代文学概论体制,从“文章”到“文学”,从自律性的教条到意识形态模式的介入,从政治化再回到学科本身,百年文论教材和教学的结构变化都源于文学观念的革新。反之,文学观念一旦僵化,文论教材和教学就失去活力。对比“文革”前后的教材,其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是把文学看成意识形态还是看成审美意识形态,两个字之差就引起了文论教材整体面貌的变化。从另一方面看,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要通过文论教材和教学得到确定,得到传播,并不断扩大其影响。不同时期的文论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论教材和教学对于形成文学观念的重要作用,现代学科体制对于构建现代人文知识谱系的重要作用。

第二,现代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文论教材和教学的发展需要不断整合各种理论资源。

文论教材和教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国外先进的文论,继承本民族优秀的文论传统,并且使二者得到有机的整合。理论资源的丰富和多元能使文论教材和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理论资源的贫乏和单一,也必然使文论教材

和教学枯萎和僵化。五四以来先是吸收西方文论,后来才是同新文学传统、革命文学传统相结合,但是又排斥和丢弃了古代文论的传统。解放后情况就更糟糕,完全向苏联文论“一边倒”,既排斥了古代文论传统,又拒绝了西方文论,最后终于走上封闭、僵化的道路,使我国的文论教材和教学远比国外落后。因此,考察百年文论教学如何吸收西方文论的现代文学观念、问题框架和文学概念,如何消化传统的文论资源,如何以传统资源纠正现代知识体系的弊端,如何有机整合各种理论资源,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这是建构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论教材和教学、建构中国现代文论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

第三,现代形态文论的建构、文论教材的建设要保持必要的弹性和张力。

文论教材既要坚守学科的自律性,要有自觉的学科意识,同时作为人文学科也必然要同时代和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要有助于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文论教材不是个人的见解,而是社会多数人对文学的理解,它要求客观、公正,不过于主观,不偏激,本身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它是对已有的思想和知识的总结,暗中规范着思想,同时也很容易束缚人的思想和观念。鲁迅当年就嘲讽过《文学概论》,看出教材暗含的规范秩序无形中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和个人的创造力。因此,一本成功的文论教材必须具备比较成熟的学术个性,善于处理好各种矛盾,克服种种困难,在学科的自律性和他律性之间,在教材的规范性和开放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弹性和必要的张力,不断地向新的时代开放,向新的文学现象开放,向新的文学观念开放,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我们通过考察百年文论教材和教学的历史沿革,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是要提供一个现代话语转换的个案。只有通过一系列个案,我们才能把握现代文学话语的形成和演变脉络,并对我们今天的一些理论命题进行追溯性的反思。我们所进行的历史考察也可称为一种理论的尝试——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解释。理论的反思并不只有通过概念的分析才能达到,借助历史的研究同样可以,也许可以更好地达到。

目 录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 (1)
----------------------	---------

前 言	(1)
-----------	-----

上编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转化

(1910—1949)

导 言 现代文学论产生与延续的历史条件	(3)
---------------------------	-----

- 一、现代文学论知识体系的基础:现代学科体制的
建立与“文学”的位置
- 二、中国现代文学论的存在方式与形态

第一章 传统文论资源的近代转化:从《文学研究法》

- 到《文学概论》
- 一、桐城派的嫡传: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
- 二、选学派与西方文论并置:马宗霍的《文学概论》
- 三、学衡派对中西文论的融合:刘永济的《文学论》
- 四、文学原理与历史研究的合体:姜亮夫的《文学概论讲述》
- 五、建立中国式文学概论的尝试:程会昌的《文论要论》等

第二章 现代文学观念的移植:引入西方文论教材

- 一、现代文学观念的早期影响:王国维、胡适、鲁迅、周作人
- 二、西方文论的间接引入: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
- 三、鲁迅的文学概论教材: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 四、体系严密的示范性教材: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
- 五、自觉的名著教材:韩德的《文学概论》

第三章 外来资源的选择与“自己的问题”:新文学作者的建构

- 一、新文学言论的经典化与理论工具的运用

二、新文学作家们的《文学概论》:郁达夫、田汉、老舍、夏丏尊、许钦文	(50)
三、文学教育、普及的需要与调和倾向	(57)
第四章 “科学的文艺论”:文学的重新定义	(63)
一、理论来源:从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唯物史观文学论”到无产阶级文学理论	(64)
二、“新兴文学论”的过渡形态与尝试	(71)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标准化	(77)

中编 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 (1949—1966)

第五章 解放初高校文艺学教学的转型

——1951—1952 年高校文艺学教学大讨论	(89)
一、文艺学教学大讨论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90)
二、文艺学教学大讨论的过程	(92)
附录:蓝翎忆高校文艺学教学大讨论	(102)
三、文艺学教学大讨论和文艺学教学转型	(105)

第六章 苏联文艺学教材在中国主导地位的确立

——北大文研班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	(114)
一、苏联文艺学教材的早期引进	(115)
二、毕达可夫和北大文研班	(118)
附录:胡经之忆北大文研班	(123)
三、如何评价解放前后引进的苏联文艺学教材	(125)

第七章 黄药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教学和北师大文研班

一、黄药眠的文论教学与解放后文论教学的转型	(136)
二、黄药眠重马列、重传统、重实践、重能力的文论教学	(139)
三、黄药眠的文论教学和大家素养	(151)

第八章 周扬、何其芳和人大文研班

一、文研班的办班背景和目的	(157)
二、文研班的机构、师资和学员	(160)

三、文研班的教学内容和方式	(166)
四、文研班的特色和成果	(173)
附录:何西来、缪俊杰、李思孝、李衍柱忆文研班	(176)
第九章 周扬和统编的文艺学教材	(200)
一、周扬和高校文科教材建设	(200)
二、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教材的意见和设想	(206)
三、对统编的文艺学教材的评价	(212)
 下编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教学 (1978—2002) 	
第十章 海南岛会议和新时期的文论教学	(221)
一、研讨会召开的背景和任务	(221)
二、关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走向和趋势	(223)
三、关于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更新	(228)
四、关于文学理论教学体系和教材的改革	(231)
第十一章 文论教学的新局面和“换代教材”《文学理论教程》	(237)
一、文论教学新局面的出现	(237)
二、“换代教材”《文学理论教程》	(241)
第十二章 面向 21 世纪的文论教学改革	(249)
一、面向 21 世纪的文论教学改革的背景	(249)
二、面向 21 世纪的文论教学改革的方案和成果	(250)
三、文论教改方案和成果所体现的教改思路 and 方向	(254)
附录:文学理论教学的双向拓展	(258)
 附录一 文学理论教材书名总录(1914—2003)	(264)
附录二 文学理论教材目次选辑(1914—1962)	(282)
后 记	(333)

**上编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
知识体系的转化**

(1910—1949)

导言 现代文学论产生与延续的历史条件

一、现代文学论知识体系的基础：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与“文学”的位置

现代文学论的建立,甚至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与现代学科体制的出现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考察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论知识体系的演变之前,有必要对文学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的产生机制进行简单的历史梳理。

华勒斯坦在他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曾指出:“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1〕}而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则是伴随着几个世纪以来大学体制的变迁而发生的。

在西方,虽然早在中世纪就已出现了体制完备的大学,但直到17世纪它的学科体系仍以“经院课程”(scholastic curriculum)为核心。它由两类学科构成:艺文和科学。艺文科又分为论理和传讯两科,诗歌则与语法、修辞并列于传讯科名下。在这个学科分类中文学显然只占据了一个偏僻的角落,这点很类似诗文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当时的解释,从属性的学科包括“有用的”和“美丽的”两类,诗歌等显然属于后者,这与中国传统功用说有差别。而这种“唯美”的性质恰恰为文学进入现代学科体制设置了障碍。

随着经院神学体制的崩溃,纯粹的认识论不再可能支持整个的教育体系,因此接踵而至的实用需求成为大学向现代形态转化的直接动力。“大学在18世纪晚期、19世纪初期得到了复兴,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场所。”

科学作为最实用的学科在这场变革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并确立了它在整个现代学科范式中的支配性地位。有研究者提出,17、18世纪出现的科学学会“标志了知识划分史上的突破”^[2]。“自然科学早在大学复兴之前就已经确立了某种自律的制度形态,它之所以行动得较早,是因为它允诺能够创造出直接有用的实际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得到社会的和政治上的支持。”^[3]专门化无疑有助于它提高效率,因此它自然采取了主动的姿态。

相比之下,人文学科的进化则几乎完全是被动的。

“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其他现代人文学科则首先以古典语文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史。^[4]

这造成了人文学科的尴尬:它无法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提出有力的辩护。“这种知识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可谓变化多端,缺乏内在的凝聚性,致使该领域的从业者无法就其学科的重要性向官方提出辩解,更无法结成统一的联盟,因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实际的’成果。”但是,值得我们特别去考量的是,这种被动状态和遭受的挤压是否从根本上促进了人文学科的自觉意识,以致它在按照现代学术规范为自己定义时特别注意突出了与其他学科的差别——尤其是与科学学科的不同^[5],以及这种文学自我标榜的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教育的传播构成一般现代人心目中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界限。

在人文学科获得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关键的一环是“自由民教育”理念的提出。这是人文学科进入现代形态后自我解释的初步尝试。所谓“自由民教育”指的是要在职业专门化教育之外另设一个人文教育领域,专以培养自由心智作为目标。“针对政府把高等教育的目的贬为只为迎合社会和经济的需要,人文学院的回应是把追寻人的至高价值,也就是培育‘完人’和不计实利地追求学问,订为自己最崇高的目标。”^[6]最早倡导这一理想的是19世纪的一批新人文主义者,其中以纽曼(Newman)和阿诺德(Arnold)等人为代表。阿诺德这样表述他的规划:“我们想要的是人性圆满和谐的发展,让思想自由奔放,摆脱成规,让自主的意识觉醒,使生活甜蜜和前景光明,这些